

像是一部黨史，在敘述到毛澤東時更是難以突破思維定式和語言自律。對此，讀者當然不難理解：共和國有着黨國政體，黨史是國史的核心，從黨史切入國史的寫作正是這些作者的長處所在。但讀者亦不難發現：有的作者在敘事中一方面寫出了毛澤東統治下中國的大災難，另一方面又對毛個人的大氣恢宏、揮灑磅礴的風格充滿了欽仰，

依然維繫着對政治領袖既有的思維定式。其實，毛的大氣恢宏不正是共和國幾場大災難的成因之一嗎？

簡言之，這套國史最重要的成就，在於其有根有據地為毛澤東時代共和國的重大政治事件進行了正本清源的梳理。雖然它未能突破體制的極限，但卻已瀕臨體制的邊緣，為共和國的歷史留下了盡可能完整、真實、準確和可信的記錄。

讀《政體與身體》

● 黃小艷



黃金麟：《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政體與身體：蘇維埃的革命與身體，1928-1937》（下引只註頁碼）一書是台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教授黃金麟關於身體史研究的新作，與其《歷史、身體、國家：近代中國的身體形成，1895-1937》（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1）對近代中國身體生成的宏觀論述不同，這本新書分析了江西蘇維埃時期中共圍繞反圍剿鬥爭所進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對民眾身體的調動，以及這些動員對建構階級化身體的重要意義，檢討了革命與身體的牽扯關係，並進一步對革命的合理性、革命的善意與強制提出了發人深省的看法。

在歷史研究中，以身體的遭遇來取代政權更迭和階級鬥爭作為研究進路，就是要在原有的認識和討論之外，「顯露革命的一些錯置現象，和隱含在革命理想與實踐中的矛盾」。

一 革命與身體

作者選擇以身體作為研究蘇維埃革命的切入點，和兩個議題有關：一個是人的存在問題，一個是歷史的書寫問題，特別是有關中國革命的書寫問題（頁7）。人的存在問題體現了歷史研究對個體生命價

馬克思主義的號召力和農民面臨的苦難與國家經歷的危機，使革命變得正當而合法。而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法的正是外來的馬列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外來勢力的同時完成了意識形態的「自我殖民」。

值、生命意義的人文關懷；中國革命的歷史書寫則如作者所說，關係着歷史的可見與不可見。長期以來，在歷史研究中對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的考察是解釋歷史的重要面向，但是以這個視角來觀看革命，就是「讓涉入革命的其他關鍵因素變得不再重要」。以身體的遭遇來取代政權更迭和階級鬥爭作為研究進路，就是要在原有的認識和討論之外，「顯露革命的一些錯置現象，和隱含在革命理想與實踐中的矛盾」（頁12），「透過革命和革命遭遇的阻滯，來省視現世的蒙昧和革命本身蘊含的蒙昧」，「提供我們一個觀看現世不合理的有力進路」（自序，頁ii）。

通過對福柯 (Michel Foucault) 等人知識／權力模式的檢討，作者認為權力不僅制約着知識的生產，而且知識的生產過程也對權力的形成產生反作用。因此，檢視蘇維埃革命對身體的建構時，必須注意「革命與身體的連動發展，特別是革命如何啟動、指引和限制身體的發展，同時又受到身體的反制和影響。」（頁264）作為一場階級革命，蘇維埃政權領導人通過對地主和富農的分田鬥爭、對蘇維埃工作人員以及紅軍和赤衛隊階級成份的強調，建構了階級化的身體，而在這個過程中，身體肉體性和社會性的抗拒或跟從，又使革命實踐與革命理想發生了或多或少的偏離，影響了蘇維埃革命的進程。這種互動關係，在蘇維埃政權為對付國民黨的圍剿所進行的擴軍、籌款、退還公債票等一系列動員中，有清楚的顯示。

對民眾生命財產的調動，「雖然符合革命的初衷——即革命的果實不會在革命者袖手旁觀下自動誕生」，但政體對身體強加的恣意與暴力，「卻說明這不是個建立在群眾意志自主上的過程。伴隨着命令、強制、游說和鼓動的是，群眾以不同的姿態，如投入、接受、妥協、逃避、屈從和抗拒等，來顯示他們的革命認同程度。」（頁159）

在身體遭遇極端階級化的對待時，蘇維埃政權內部仍然存在着待遇的高下、級別的高低，階級的差異並沒有一筆勾銷。但是，這個階級化的分類卻「依照既有的生產關係和階級位置，把每個人置放在一個生與死、信任與不信任的境遇中。」（頁87）貧富對立及其之間的階級對抗，通過土地革命不斷塑造着農民的政治意識和階級意識。與此同時，各種動員技藝的使用，也使得蘇維埃的身體經歷着一場工具化的對待。

動員蘇區青年參軍所使用的親情感化、兒童對那些不願意當兵的青年的「羞辱」、把有些逃跑的士兵從軍期間國家給予家屬的照顧，換算成經濟利益作為其拒絕歸隊的代價的做法，也讓我們看到「這種因應着政治需要而產生的經濟計算和動員，特別是身體的調動和訓練」，以及在革命過程中浮現的「認知差距和利益計算，以及相應產生的強制動作。」（頁166）蘇維埃政權以婦女、兒童、老人和傷殘士兵填補青壯年人口留下的勞動力空白的措施，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社會的家庭倫理。這種措施導致的婦女身體的工具化對待，也是作者在檢討蘇

維埃革命與身體的關係時着重強調的部分。他認為國家的幫助確實有助於婦女掙脫父權的羈絆，但是另一方面，「國家正將婦女的身體置放在更大的戰略空間中，讓它成為國家工具性驅使的對象。」(頁273)

二 革命的善意與強制

「革命」是一種意識形態，是一種對抗現存體制的手段。「革命」合法性的獲得，來自於革命者的宣稱：中國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而無產階級正是擔負了「解放」的光榮使命。因此，馬克思主義的號召力和農民面臨的苦難與國家經歷的危機，使革命變得正當而合法。值得深思的是，這場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法的正是外來的馬列主義，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在反對外來勢力的同時完成了意識形態的「自我殖民」。

一種沒有階級剝削支配和異化的快樂，賦予蘇維埃政權對民眾身體的調動和計算以道德合理性。「在這種『公義』的支持和想像下，蘇維埃政權能以問心無愧、義正詞嚴的姿態，將革命的代價施加在所要解放的人群身上。……並認定自己的行為正當。」(頁165) 無產階級革命領導者的地位，在這個理論的指導下取得了道德優先權，道德優先權的賦予在蘇聯和中國變成了道德必然，使革命的善意——「解放」的背後充滿着威逼、強制和欺騙、集體凌駕個人，以及想像的利益支配現實的利益。中國共產黨人在進行這場階級革命時，懷着的那份消

弭剝削和為窮人出氣的热情，「不能抑制善意的質變」，「這種從人道思考走向權力計算，甚至形成暴虐的合理性發展」，說明「歷史不是一個主觀意志獨立決定的結果」，「去掉善意，我們將看不到歷史所以如此發展的原因。」(頁202)

儘管蘇區的領導人一次次嚴禁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使用強制、命令的方式解決問題，但蘇維埃革命並不會完全像革命者所宣傳的那樣，在善意的軌道上發展。因此作者認為：

土地革命成就的其實不是解放，而是臣服和約束。因為在將農民從地租、捐稅和高利貸的深淵中解放出來時，蘇區的統治者從來沒有忘記要他們感恩地將一家所得和一己之力，奉獻給幫助過他們的蘇維埃政權。這種重新置入權力關係的發展，讓解放變成新的政治義務的開始。(頁181)

籌款、退還公債票運動中體現的需索和要求、威逼和計算，都說明「解放」的事實並不存在。

至於防止士兵逃跑所制訂的措施，更清楚顯現「革命」對於個體身體的凝視和工具對待。例如，動員逃跑士兵歸隊時，把士兵當兵期間家屬從優待紅屬條例中獲得的照顧和補償，按照勞動法換算為經濟指標，作為其不歸隊應該付出的代價。當逃跑的士兵發覺一輩子也無法還清這筆巨債時，有的人只能回到紅軍部隊中。而工作人員用「革命」與「不革命」的分野來「要挾」士兵歸隊，這個無限上綱的方式也

中共黨史編纂學對土地革命的評價極高，但是，作者認為這是一個迷思。他發現土地革命沒有像革命者所想像或宣稱的那樣，激發中下層農民一致走上革命之路，原因在於中共在江西時期搖擺不定的土地政策和階級政策。

壓迫着一部分逃跑的士兵自願回到部隊。在這裏，「革命的熱情和理想最後只能以身體的『不自由』來表現」（頁252）。

三 革命的「應然」 和「實然」

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中，農民是革命的主力軍。共產黨人把傾斜於農民的土政策作為動員他們革命的重要措施。中共黨史編纂學對土地革命的評價極高，但是，作者卻認為這個歷史唯物論的聲稱是一個迷思。他發現土地革命沒有像革命者所想像或宣稱的那樣，激發中下層農民一致走上革命之路，原因在於中共在江西時期搖擺不定的土政策和階級政策。這種極左的政策極易使原來的一無所有者在得到土地和生產資料以後，因努力生產變成地主而再次成為階級敵人，在對付國民黨圍剿所進行的籌款運動中遭到新一輪的剝奪。「努力生產換來的可能只是打『發財人』的行為在自家門口的出現。這種生產等於招禍的發展，自然無法激勵蘇區的生產力和生產意願。」（頁176）所以，除了國民黨的圍剿對蘇區造成的軍事壓力和經濟封鎖外，民眾的生產意願也是造成蘇區的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原因。

以土地和財產的分配作為號召農民的做法，有其合理性，然而這個看似合理的舉動，「並沒有因為它的伸張正義色彩就獲得農民的全部信賴。」（頁169）歷史唯物論的「應然」

沒有變成歷史的「實然」。於是，這種革命構想與革命實踐的差別，使得更多摻雜着利益計算的動員不斷出現。為甚麼中國共產黨在重新分配了土地和財產，對民眾實施了綿密、細緻的動員，並以解放相號召的情況下，仍然有一部分青年不願意加入少先隊或者紅軍呢？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僅會因為革命實踐對革命理想的消磨而走上與想像不同的道路，還會因為革命所要「解放」的對象的猶疑、自私這些人性的弱點而偏離革命的預設軌道。在對抗國民黨的圍剿時，蘇區青年以各種方式逃避參加少先隊，是因為一旦加入組織，就要在情況需要時跟隨紅軍和赤衛隊進行游擊作戰；而一旦參加紅軍的反圍剿作戰，他們的生命就會面臨危險。

在共產主義革命中，勞工一直被當作弱者來加以保護。但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頒布後，蘇維埃政權的生產卻面臨着失序的狀態。在這個過度「討好」勞工的法律下，即使工人消極怠工，工廠主也不敢解僱工人，因為工廠須要付給工人高額的解僱金直到他們找到新的工作，而勞動時間的縮短也使生產下降。這種情況「讓勞動所需要的紀律和秩序變得蕩然無存」，而「為弱者伸張正義」的勞動法帶來的紀律和秩序的破壞，也讓蘇維埃政權飽嘗革命的苦果（頁298）。革命的不易於此可見。但毋庸置疑，中國農村的現狀一直賦予伸張正義、「解放」的革命聲稱巨大而持續的吸引力，使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獲得廣大的群眾基礎。

歷史的複雜性在於，它不僅會因為革命實踐對革命理想的消磨而走上與想像不同的道路，還會因為革命所要「解放」的對象的猶疑、自私這些人性的弱點而偏離革命的預設軌道。